

新诗研究丛书

洪子诚 主编

现代诗的再出发

中国四十年代现代主义诗潮新探

张松建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北京市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新诗研究丛书

洪子诚 主编

现代诗的再出发

中国四十年代现代主义诗潮新探

张松建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诗的再出发:中国40年代现代主义诗潮新探/张松建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1

(新诗研究丛书)

ISBN 978-7-301-15887-6

I. 现… II. 张… III. 诗歌—文学研究—中国—现代 IV. 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73597号

书 名: 现代诗的再出发——中国四十年代现代主义诗潮新探

著作责任者: 张松建 著

责任编辑: 张雅秋

封面设计: 奇文云海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5887-6/I · 2156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 pkuwsz@yahoo.com.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2022

印 刷 者: 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mm×980mm 异16开本 23.75印张 342千字

2009年11月第1版 2009年1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9.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电子邮箱:fd@pup.pku.edu.cn

《新诗研究丛书》· 出版说明

推动中国新诗研究的深入开展,出版相关的有一定学术质量的研究成果,是北京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的工作重点之一。为此,在北京大学出版社的支持下,拟定了组织出版《新诗研究丛书》的计划。丛书的选题主要是:

- 一、新诗理论研究;
- 二、新诗史,包括断代史、流派史、诗刊史等;
- 三、诗歌文本阅读和重要诗人研究;
- 四、新诗文化问题研究;
- 五、有价值的新诗研究资料;
- 六、其他。

北京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
《新诗研究丛书》编委会
2005年4月

序

王润华*

一 发现新史料与重绘现代主义诗潮地图

当年张松建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提出博士论文选题,决心要研究40年代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很多学者的第一反应,就如作者自己所预料到的,“九叶诗派”(或者“中国新诗派”)几乎等同于40年代现代主义诗歌的全部内容,题为“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史”的现有著述都以探讨“九叶”为焦点。同时在不少学者的印象中,40年代现代主义诗歌纯粹是西方影响之下的产物,而与渊源深厚的古典传统无甚关系,这似乎已是无人质诘的定论。就如他自己所害怕被质疑的:“就这个选题而言,难道还能挖出什么新资料、提出什么新解释吗?”

但是张松建还是决心重新书写40年代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史,而且以最传统但最辛苦的工作开始:考掘原始史料,以客观的史实重新绘画40年代现代主义诗歌的版图。这是目前爱走捷径的年轻学者没耐心、没兴趣又懒惰使用的基础研究方式。就如张松建在序文中所说,在2003年他从新加坡返回中国大陆,在京沪两地的图书馆埋头调研,浏览了出版于40年代中国各地的两百余种文学期刊,查阅过发行于京沪地区的二十余种报纸副刊,透过对这些字迹漫漶的原始史料的考掘,一幅清晰完整、带有另类意味的“文学史图像”隐约浮现出来:“我们吃惊地发现,在40年代从事现代主义诗歌创作者,远远不止于‘九叶’,至少还应该包括平津地区的吴兴华、沈宝基,上海的路易士,移居中国香

* 中国台湾元智大学人文社科学院院聘教授兼国际语言文化中心主任

港和桂林的鸥外鸥,西南联大的王佐良、罗寄一,离散法国的罗大冈,中法大学的叶汝琏和王道乾,等等。”

当然这不是张松建成功的唯一绝招。他的突破还要依靠新批评的内在文本细读、比较文学、文化研究的越界跨国的方法与广阔视野的审视:“在研究方法上,本书注意文本、观念与历史间的互动,必要时融入社会史的内容,兼采‘文学性’与‘文化性’的双重焦点,争取把文本、历史与理论融为一体。”他还强调“在个案研究的章节里,本书还涉及比较文学中的影响研究,在坚实史料的基础上确立事实联系,但并不作为论述中心。”他能摆脱旧习,尝试新的探讨途径,“祛除一些流行性的误解和似是而非的定论”:

在不少学者的印象中,40年代现代主义诗歌纯粹是西方影响之下的产物,而与渊源深厚的古典传统无甚干系,这似乎已是无人质诘的“定论”。对于“九叶”而言,这个解释具有一定的有效性。但是,如果我们能够超越狭隘的学术视野,不把目光局限在“九叶”身上,而从更广阔的文学史背景出发,将更多被埋没的诗人纳入阅读地图,将会发现,40年代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兴起,实际上得益于两股力量的交相为用:外来影响的本土化与传统资源的现代化。

在论述现代性与传统的话语纠葛时,本书将思考一些关键性问题:传统对个人提供的支持意识怎样在文本层次上运作起来?传统与现代的逻辑相关性和历史连续性又如何彰显?在论述外来影响时,笔者将不满足于作表面上的比附而是试图观察,西方现代诗如何在中国文艺界得以译介和播散?哪些作家学者参与了这个跨文化对话的过程?由此怎样影响了中国现代主义诗歌自身的历史形象?在吁求文艺大众化的时代主旋律里,左翼作家是如何描述、理解和判断这些外国诗作的?艾略特、里尔克、奥登、波德莱尔在中国的影响及其接受,是仅仅停留在肤浅的表面还是具有实质性的意义?是个别的兴趣和暂时的现象还是具有相当的深度、广度和持续性?在这种文学接受和文化斡旋的过程中,中国诗人吸取了什么同时又拒绝了什么?而他们这样决断与取舍的目的和依

据何在？现有西方学者的现代性论述能否完全适用于中国现代主义诗作的分析？与作为典范的西方现代诗相比，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主体性何在？

就是这样张松建有了突破性的新发现，重绘并扩大了40年代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版图。

二 跨越知识领域与文化研究的现代主义诗学

张松建先后在中国与新加坡接受学术训练，继承了中国史料考据传统，具有中国社会政治的扎实知识，也受到了西方传统汉学(Sinology)与中国学(Chinese studies)的严格训练。他做学问重史实依据，善于跨越文化与学科的思考，进行深入的专题研究。他说：“若能对40年代现代主义诗歌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应可祛除一些流行性的误解和似是而非的定论，使得重绘现代主义的地图成为可能。一言以蔽之，本文冀能在史料新发现的基础上进行文学史的再审视。”西方汉学的知识背景使张松建突破了中国传统思考方式。中国研究是在区域研究(Area Studies)的兴起与带动下从边缘走向主流的。区域研究的兴起，是因为专业领域如社会学、政治学、文学的解释模式基本上是以西方文明为典范而发展出来的，对其他文化所碰到的课题涵盖与诠释性不够。对中国文化研究而言，传统的中国解释模式因为只用以中国文明为典范而演绎出来的理论模式，如性别与文学问题，那是以前任何专业都不可能单独顾及和诠释的。在西方，特别是美国，从中国研究到中国文学，甚至缩小到更专业的领域中国现代文学或世界华文文学，都是在区域研究与专业研究冲激下的学术大思潮中产生的多元取向的学术思考与方法，它帮助学者把课题开拓与深化，革新了理论与诠释模式，沟通了世界文化。张松建这个论题使用了大量原始史料，包括中、日、西方语文的档案资料，这是窄而深的研究专题(monograph)，不只是诗学探讨，也是文化专题的典范著作。

从本书可见张松建把中国传统的考据学与西方汉学及中国学的治学方法与精神结合成一体，其跨国界的文化视野给中国现代主义诗学

研究带来全新的诠释方式与世界性的意义。

三 40年代中国的现代主义诗歌再出发的“再出发”的需要

张松建说40年代乃是中国现代诗的“再出发”阶段。抗战以来的中国新诗,随着世变日亟,不仅在题材内容、思想情感、审美意识、语言风格等方面发生了历史性巨变,而且诗的生产流程和发表方式也得到了大幅度的改进。于是考察40年代中国的现代主义诗歌的生成,离不开四个参照系数:

抗日战争与国共内战的历史背景,知识左翼扩大化的局面,文艺大众化论战,以及西方现代主义诗歌典范。穿梭于历史、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等多重语境的交叉地带,完成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身份辨识,观察它如何在与其它话语进行竞争的历史进程中展现一己的“形象”,描述它与西方典范之间的“家族形似”以及中国经验和本土性格,辩驳发生于审美因素与文化政治之间的纠葛,无疑构成了本书的研究重点。

我希望张松建这本书不是40年代中国现代诗研究的结束,而是再出发。他所完成的研究部分只是中国大陆部分,还有40年代的中国台湾、东南亚、美国各地的华文现代诗的地图也是亟待完成的。我在《解构〈现代文学〉与中国台湾现代主义文学的神话》(收入《中国台湾新文学发展重大事件论文集》,中国台湾文学馆,2004)中曾指出,在中国台湾,1960年创刊的《现代文学》常常被人当做中国台湾现代文学的起点。也有些学者认为1953年纪弦创办《现代诗》,三年后宣告成立“现代派”,可视为中国台湾现代文学的起点。1949年创刊的《自由中国》上就有不少现代主义作品与新批评论文发表,如李经(卢飞白)与夏志清等。《文学杂志》也被看做现代文学的起点。这都是太过简单的概括,忽略了文化、文学艺术的变化过程,有其历史内在的延续性,再加上许多外来的因素。一本杂志或一个人不可能改变文化/文学艺术的发展历程。

英国理论家雷蒙·威廉(Raymond Williams, 1921-1988)在讨论整体文化及其文化产品如文学作品的关系时指出,要认识到文化变化过程及强调历史内在的延续性。任何社会的文化系统都是多元并存的,文化的变化实际上是各种文化因素的重组过程,既有主导的文化因素(dominant),也有过去的社会文化延续下来的文化因素(residual),但也有酝酿着、潜伏着的新文化因素(emergent)。现代文学既是 residual,也是 emergent。因为作家从中国大陆带来的现代文学、中国大陆 30 年代的现代主义直接影响着中国台湾文坛的现代主义,日本统治下的中国台湾现代主义因为被政府文艺政策压制着,算是 residual,同时以《现代文学》为代表的现代主义及被引进的西方现代文学,则算是酝酿着的新文化 emergent。过去学者往往看见来自五四的文学传统在中国台湾受到查禁,而误以为被切断了整个五四的新文学传统,包括现代主义,那是不理解或简化了文化发展的实际复杂过程。很多文化思想因素是在主导性的思想意识下潜伏性地生长延续着。在戒严时期以前,可能出于政治的忌讳,如纪弦说现代诗是“横的移植,而非纵的继承”,事实上他在中国大陆以“路易士”为笔名写诗时,就接受了 40 年代现代主义的洗礼,开始写现代诗了,另外创世纪、现代诗、蓝星诗社的诗人都是点火人。张松建的 40 年代现代诗版图研究,如果扩大到中国台湾,很多问题便解决了。

我相信 40 年代前后,现代主义诗歌早已传播到东南亚,甚至不少现代主义诗人出走到南洋。我们现在已知道,在 40 年代多元化的现代主义诗人中,出走到中国香港及东南亚的诗人实在不少,如杜运燮、徐速、力匡、徐訏、杨际光(贝娜台、罗缪)、燕归来(邱然)。很多现代主义的火种就是在不知不觉的情形下被带到东南亚,最特殊的例子是杜运燮。他原来是在马来亚北部霹雳州的小镇实兆远(Sitiawan)出生长大,1939 年到了西南联大,成为新生代现代主义诗歌的代表、冬青文艺社的重要分子,出版了《诗四十首》(1946,上海文化出版社),这是杜运燮也是 40 年代最创新的现代诗之一。他在 1946 年返回新加坡的名校南洋女中与华侨中学教书,1950 年返回中国。可惜至今无人注意到杜运燮这段时期的经历对于现代诗的意义。这些应该都是张松建所绘的新

地理版图中缺乏的内容,希望他重新做一次研究,重画一次地图。张松建是最具资格把40年代现代诗的地图扩大到海外的学者,希望他能继续完成。

四 结 论

所以这本书对40年代现代主义的研究,有许多重大的突破,很多新的论点。作者不但考掘出许多没人注意的史料、提出许多新的解释,而且扩大了现代主义诗歌的领域,建立了“新诗现代性”的多元化论说。另外作者研究论述的方法与视野,也具有典范性。

目 录

序	王润华(1)
导 论	(1)
第一章 背景知识	(8)
第一节 “现代”、“现代性”、“现代主义”	(8)
第二节 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的源流	(22)
第二章 西方现代主义诗歌在中国 40 年代的译介	(34)
第一节 艾略特在中国的传播	(35)
第二节 奥登在中国的传播	(49)
第三节 里尔克在中国的传播	(64)
第四节 波德莱尔在中国的传播	(77)
小 结 翻译的政治	(93)
第三章 中国 40 年代现代主义诗潮的趋向	(96)
第一节 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定义	(98)
第二节 中国 40 年代现代主义诗潮的兴起	(103)
第三节 中国 40 年代现代主义诗潮的总体性	(115)
小 结 现代诗的再出发	(127)
第四章 中国 40 年代现代主义诗学叙论	(130)
第一节 “抒情主义”的新变	(134)
第二节 作为一门“手艺”的诗歌写作	(152)
第三节 “去戏剧化”的日常经验	(161)
第四节 重识袁可嘉“新诗现代化”方案	(169)
小 结 诗史互动与话语协商	(190)
第五章 城市地理、现代主义与政治乌托邦	(192)
第一节 鸥外鸥：地缘政治、反讽诗艺与形式实验	(194)

第二节	杭约赫:震惊体验、殖民历史与乌托邦幻觉	····· (203)
第三节	唐祈:城市抒情诗与时间意识形态	····· (209)
第四节	陈敬容:感伤主义的城市漫游人	····· (214)
小 结	逆写城市与中国经验	····· (222)
第六章	现代性危机与自我认同	····· (224)
第一节	穆旦对“美学现代性”的确认	····· (224)
第二节	罗寄一与“寻求现代认同”	····· (234)
第三节	路易士的“边缘人心态”	····· (239)
第七章	抒情二型:沉思的诗与青春写作	····· (252)
第一节	冯至的《十四行集》	····· (252)
第二节	郑敏的《诗集(1942—1947)》	····· (261)
第三节	叶汝琏的《旧作新诗钞》	····· (266)
第八章	诗与公众世界	····· (275)
第一节	杜运燮:诗坛顽童的“轻松诗”写作	····· (276)
第二节	穆旦:心理分析与科技意象	····· (282)
第三节	袁可嘉、王佐良:日常生活与政治寓言	····· (292)
小 结	从审美到政治	····· (296)
第九章	新古典主义的实验	····· (298)
第一节	现代性与“古典新诠”:论吴兴华	····· (298)
第二节	从互文性到“宇宙意识”:论沈宝基	····· (313)
第三节	书写“故国想象”:论罗大冈	····· (324)
结 论	重建现代主义的历史叙事	····· (334)
附录	王道乾的颓废诗	····· (338)
主要参考书目		····· (348)
后 记		····· (365)

导 论

本书的研究对象是中国 40 年代的现代主义诗歌,尤其是诸多诗人对“新诗现代性”的多元化探索。众所周知,五四新文学伊始,新诗作者即致力于现代性的追求,现代主义诗人的努力颇为可观。一个被普遍接受的想法是,从 20 年代的象征派诗歌到 30 年代的现代派诗歌,从 40 年代的“九叶诗派”到 80 年代以还的新世代诗潮,中国现代主义诗歌构成了一条脉络清晰的历史链条,诚可谓起源甚早、绵延既久而影响亦相当深远。学术界公认,抗战及 40 年代乃是中国现代诗的“再出发”阶段。抗战以来的中国新诗,随着世变日亟,不仅在题材内容、思想情感、审美意识、语言风格等方面发生了历史性巨变,而且诗的生产流程和发表方式得到了大幅度的改进,读者与作者之间也有了更密切的互动。西南联大诗人群体此时开始浮出历史地表,冯至、穆旦、郑敏、杜运燮、袁可嘉的诗创作,吸引了不少批评家的注意。重庆的陈敬容、唐祈、杭约赫也以辛勤的笔耕加入到现代主义的合唱队。在未来数年内,这种新诗现代性的探索南北呼应,迅速达到丰富多彩的程度:同人刊物《诗创造》和《中国新诗》创办于上海,穆旦的《探险队》、《旗》与《穆旦诗集》,陈敬容的《星雨集》和《交响集》,唐祈的《诗第一册》,杭约赫的《复活的土地》,郑敏的《诗集 1942—1947》等诗集亦相继出版。及至 1949 年,这种现代主义诗歌开始隐伏于历史深处,到了 80 年代,它才终于再度成为“辉煌景象”。

不过遗憾的是,迄今为止的海内外学术界仍然习惯于把“九叶诗派”(或者“中国新诗派”)等同于 40 年代现代主义诗歌的全部内容。这其实不难理解。“九叶”之广为人知,自身的文学成绩撇开不说,在很大程度上还要归功于这些当年的文学运动的参与者,日后因为多种原因而成为文学史的中坚,在他们的不断追忆中强化了这一对象的历史意义,以至人们在写作这段文学史时,“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所

以,从表面看来,本书的论题似已受到了“深密”的研究。十几年来,大陆出版的现代文学史著述不下 100 部,往往论及“九叶”的艺术成就。题为“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史”的现有著述也以探讨“九叶”为取向。以“九叶诗派”为选题的学位论文和研究著作至少已有六部之多。必须承认,“九叶诗派”从当初饱受打压的“边缘”游向今日的文学史“中心”,有其内外原因和历史正当性;而诸多学者对此课题的精细研究,也为“九叶”奠定了文学史上的经典地位。那么,经过这些学者的辛勤而有创见的研究之后,对于“中国 40 年代现代主义诗歌”这个选题而言,难道还能挖出什么新资料,提出什么新解释吗?

2003 年秋季,笔者在京沪两地的图书馆调研,浏览了出版于 40 年代中国各地的两百余种文学期刊,查阅了发行于京沪地区的二十余种报纸副刊,透过对这些字迹漫漶的原始史料的考掘,一幅清晰完整的、带有另类意味的“文学史图像”隐约浮现出来。我吃惊地发现,在 40 年代从事现代主义诗歌创作者,远远不止于“九叶”,至少还应该包括平津地区的吴兴华、沈宝基,上海的路易士,移居香港和桂林的鸥外鸥,西南联大的王佐良、罗寄一,离散法国的罗大冈,中法大学的叶汝珪和王道乾,等等。他们以才情与学养催生出新秩序的曙光:或铭刻都市图像,或醉心颓废诗境,或发抒政治关怀,或探勘历史迷魅,或默察世间万物,或穷究生命迷思,不约而同地汇集到“现代主义”这面大旗下,为中国现代文学描画出一段别样的风姿。触摸历史,对照当今,我们也可发现,在如此一个多声部的大合唱中,“九叶”与其他声音平等竞争,互有消长,尚无“东风压倒西风”之势。但是当“九叶”沉寂三十余年后被“追认”为一个现代主义流派之后,它在新诗史叙述中一下子排挤和压抑了其他声音,一枝独秀,享尽恩宠。当然,上述诗人之沦为“文学史上的失踪者”,大半由于文献埋没不彰的原因,当然也与学术风潮有关。吴兴华的“古典新诠”看来与时下流行的“新诗现代性”论述不大合拍。沈宝基饱含宇宙意识的诗章,大可追溯到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王道乾的诗歌世界充斥着死亡气息、暴力想象与憎女症的重重阴影。罗大冈的美丽乡愁似乎“如今已觉不新鲜”。诸多因素使他们难入研究者的“法眼”,在此不难理解。但是无论出于何种理由,要想细查现

代主义的文学谱系,这些“漏网遗珠”不应遭受忽视,仍有待进一步的考察。因此,若能对40年代现代主义诗歌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应可祛除一些流行性误解和似是而非的定论,使得“重绘现代主义的地图”成为可能。一言以蔽之,本文冀能在史料新发现的基础上进行文学史的再审视,不避繁琐,以广知闻,庶几不辜负前辈的筚路蓝缕,苦苦耕耘。

在不少学者的印象中,40年代现代主义诗歌纯粹是西方影响之下的产物,而与渊源深厚的古典传统无甚干系,这似乎已是无人质诘的“定论”。对于“九叶”而言,这个解释具有一定的有效性。但是,如果我们不把目光局限在“九叶”身上,而是从更广阔的文学史背景出发,将更多被埋没的诗人纳入阅读地图,将会发现,40年代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兴起,实际上得益于两股力量的交相为用:外来影响的本土化与传统资源的现代化。举例来说,在吴兴华、沈宝基、罗大冈那里,无论美学理念还是意象诗境都是从传统诗学中获致灵感的源泉而且有相当精彩的表现。即使就外来影响而论,学者们也太过强调英美现代诗的启悟,而忽略了德法现代诗的营养。解志熙在一封致叶汝琏的私函中已精准地指出了这一点。事实上,法国诗人瓦莱里、阿波里奈尔、阿拉贡、魏尔兰、马拉美、兰波的作品在40年代各地的报刊上,均有相当数量的译介。至于波德莱尔与陈敬容、汪铭竹、王道乾的因缘,则尤其值得深究。德国诗人里尔克对冯至、郑敏的影响已是老生常谈,但他对吴兴华的影响则缺乏关注。即使当人们议论艾略特、奥登这些英美诗人对新诗作者的影响时,也过分依赖于数量有限的选本、专集而未能广泛搜罗散布于各地报报刊上的译介文章,导致他们在考察影响研究时,缺乏坚实史料的支持。又譬如,在论述现代主义诗论的建构时,学者们习惯于把目光盯紧李广田的《诗的艺术》、废名的《谈新诗》、朱自清的《新诗杂话》、袁可嘉的《论新诗现代化》和唐湜的《新意度集》这几部习见的专著,而忽略了梁宗岱、孙毓棠、沈宝基、吴兴华、穆旦、徐迟、鸥外鸥、胡明树、冯至、路易士撰写的大量零碎性的诗论,以至于对40年代现代主义诗论的形成过程缺乏周详的辨正,一些论断缺乏普适性和概括力,有含糊其辞、大而化之的嫌疑。出于上述理由,在论述现代性与传统的话语

纠葛时,本书将思考一些关键性问题:传统对个人提供的支援意识怎样在文本层次上运作起来?传统与现代的逻辑相关性和历史连续性又如何彰显?在论述外来影响时,笔者将不满足于作表面上的比附而是试图观察西方现代诗如何在中国文艺界得以播散,哪些作家学者参与了这个跨文化对话的过程,由此怎样影响了对中国现代主义诗歌自身的历史形象?在吁求文艺大众化的时代主旋律里,左翼作家是如何描述、理解和判断这些外国诗作的?艾略特、里尔克、奥登、波德莱尔在中国的影响及其接受,是仅仅停留在肤浅的表面还是具有实质性的意义?是个别的兴趣和暂时的现象还是具有相当的深度、广度和持续性?在这种文学接受和文化斡旋的过程中,中国诗人吸取了什么同时又拒绝了什么?而他们这样决断与取舍的目的和依据何在?现有西方学者的现代性论述能否完全适用于对中国现代主义诗作的分析?与作为典范的西方现代诗相比,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主体性何在?

就体例而言,本书属于断代史(40年代)、流派史(现代主义)与文体史(诗歌)的交叉研究。一个方便的处理方案是:把中国40年代现代主义诗歌这个命题拆解为三个单元:中国、40年代、现代主义,透过对于这三个同心圆的描述、分析和判断,彰显出论题的中国性、代际差异和身份识别。但是,这样做仍会潜伏着一定的危险性。如果一边倒地夸大现代主义诗作的审美优异性,势必会遮蔽它先天的盲点和误区,也反射出我们企图把当下的理论先见和价值预设植入到历史现场中的潜意识冲动,而且会忽略对于现代主义诗歌得以形成的诸多历史条件进行深度分析。对于40年代的“代际差异”的强调,也有可能人为地制造出一种“两极化”的历史幻觉并且不自觉地落入线性目的论的怪圈中。倘若只在“本土/西方”的视野中进行论述,必然会牺牲掉问题的尖锐性以及丰富的历史内容。在研究方法上,本书注意文本、观念与历史间的互动,必要时融入社会史的内容,兼采“文学性”与“文化性”的双重焦点,争取把文本、历史与理论融为一体。在考察40年代现代主义诗歌的生成与变化时,本书认为有四个必须顾及的参照系:抗日战争与国共内战的历史背景,左翼知识分子阵营扩大化的趋势,有关文艺大众化与民族形式问题的论争以及对西方现代主义诗歌典范的译介。

在考察一些重要观念的生成变化之时,我们无法在洛夫乔伊封闭式的观念史框架内进行而必须采用曼海姆“知识社会学”的方法。本书在论述现代主义诗论的形成时,涉及历史变革如何影响观念的起伏流变,批评家如何迂回前进以化解先锋诗学与大众化诗学的冲突。同时,本书试图把多种竞争性的声音放回到“新诗现代性的追求”这样一个互动性的整体格局中,以图观察诸多诗歌话语之间的对抗、斡旋和妥协的踪迹。进而言之,本书不看重观念的最后“凝固”的结果而是关注观念如何结晶化的历史过程。

在个案研究的章节里,本书还涉及比较文学中的影响研究,在坚实史料的基础上确立事实联系,但并不作为论述中心。鉴于这一时期的现代主义诗歌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本书打算在不同章节对一些西方文学/文化理论进行必要的筛选和整合,这其中包括了豪(Irving Howe, 192—1993)、特瑞林(Lionel Trilling, 1905—1975)、史本德(Stephen Spender, 1905—1995)关于现代文学的开拓性研究,韦伯(Max Weber, 1864—1920)、哈贝马斯(Jugen Habermas, 1929—)、吉登斯(Anthony Giddens, 1938—)关于社会现代性的论断,伯曼(Marshall Berman, 1940—)和加利奈斯库(Matei Calinescu)对文学现代性的观察,谢弗德(Richard Sheppard)、佛克玛(D. W. Fokkema, 1931—)、莱文森(Michael Levenson)、史泰德(C. K. Stead, 1932—)、卡尔(Frederick Karl, 1927—2004)关于现代主义源流的表述,勒汉(Richard Lehan)、派克(Burton Pike)、斯皮尔斯(Monroe K. Spears, 1916—1998)、布拉德白瑞(Malcolm Bradbury)和麦克法兰(James McFarlane)关于都市环境与现代主义文学之关系的分析,赛义德(Edward Said, 1935—2003)、詹明信(Fredric Jameson, 1934—)、威廉姆斯(Raymond Williams, 1921—1988)对现代主义的文化政治的诊断,等等。考虑到这些理论话语产生于西方的特定历史条件,除非加以改造才能适用于中国文学的描述和分析,因此不能不加分析地使用一些普泛性概念,必须在了解其理论预设和适用范围的基础上,发展出恰切的历史叙事。举例来说,卡利奈斯库所谓的“媚俗”(kitsch)概念对分析30年代的上海新感觉派小说就很有用,因为后者产生于上海的都市文化、商业气息、大